

朝宗

 黃河與中華文化



侯甬堅



版社

侯甯堅 / 陝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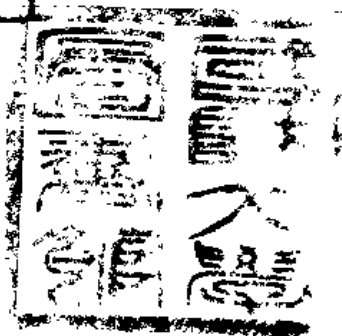


2 030 8967 4

朝宗



黃河與中華文化





• 羊角丛书 •

朝 宗

——黄河与中华文化

侯雨坚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总经售处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7印张 5插页 15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419-2258-7/G·1990

定价：(简精) 5.15元

《羊角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0年7月)

主	编	赵喜民	孙 晓	
副	主 编	陈绪万	韩养民	苏 君
常	务 编 委	刘孟泽	孙 晓	苏 君
		吴祚来	彭 林	章义和
编	委	卜宪群	牛克成	杨 明
		杨念群	李宝生	张 毅
		张首映	罗传芳	黄金山
		廖广洲		

6.21.7/6/1

编者献辞

忘掉的一切又重新拾起。如同一首歌，一只带血的喉咙，一串用剪刀剪断又重新复结的心灵的碎片。坦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羊角丛书》就是我们用这些碎片编织的一束心灵之花。

《羊角丛书》是思考的丛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躁的时代。新旧文化的撞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股旋流，观念的更新远过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焦躁使我们惊趋新奇，而对任何都不加深思地一略而过；焦躁使我们常常产生救世主般的激情，而后由于某种失意则怨天尤人、心灰意冷；焦躁使我们不能平静地安放自己心灵，仔细审视我们的过去，严肃思考我们的未来。从思想解冻至今，我们走过了从敏感到呐喊、怀疑、信仰淡薄、理想式微这一过程。我们似乎深深陷入一种命定式的痛苦。我们已应该理解，在这个时代，呐喊是苦涩的，怀疑和对怀疑的怀疑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谢绝自己的使命。然而，诚实的思考不应羞愧。我们应该是思考的一代。

《羊角丛书》是研究人的问题的文化丛书。

人是文化的主体。这个丛书以分析积淀在中国人身上丰富的精神文化为主旨；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情感、道德和生活习俗为内容。它注重实证与介绍，力求对民族精神中深层文化内涵进行一些有益的和新颖的剖析。它赞赏一家之言的学风，相信读者的智慧。它不是赠送读者的一把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而是在每本书提供的不同文化现象中，与读者一起提问、思考、启发，共同理解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中国人。

羊角古汉语意指曲而上升的旋风，出典于《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书名羊角，表达了我们编委会的志向和追求。现在，全国文化研究热潮方兴未艾，愿我们的丛书能在这热潮中掀起一卷卷闪亮的浪花。

《羊角丛书》编委会

1988年5月20日

目 录

- 1 惨则鲜于欢，劳则徧于惠 (1)
——由混沌导向文明
 - 1.1 流域的原始状态 (1)
 - 1.2 促使人生觉醒 (14)
 - 1.3 滋养文化进步 (34)
- 2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54)
——地平线上的天朝上国
 - 2.1 已知大地形状和特征 (54)
 - 2.2 天下之中·中国·中轴对称 (69)
 - 2.3 观察视角：陆地与海洋孰优孰劣 (88)
- 3 百川灌河，河朝宗于海 (106)
——从局地走向整体的中国社会
 - 3.1 向心力：黄河的纽带作用 (106)
 - 3.2 凝聚力：黄河的圈层功效 (121)

3.3	渗透力：黄河的辐射功能	(136)
4	居移气，养移体；习俗移志， 安久移质	(159)
	——华夏民族性格的生成与光大	
4.1	生生不已，延续生命	(159)
	——人生第一要义和目标	
4.2	雄健刚烈，自强不息	(176)
	——一个民族的不可征服性	
4.3	温柔敦厚，择善而从	(195)
	——古代东方的和平理想和善良本色	
	结束语	(210)
	后 记	(216)

1 惨则鲜于欢，劳则徧于惠

——由混沌导向文明

1.1 流域的原始状态

黄河河道远在第三纪的最后一个时期——上新世（距今 1200—300 万年）之前就存在了。至第四纪更新世（距今 300—1 万年）早期，华北平原依然是气候湿热，植物生长茂密，河湖相沉积景观到处可见，渤海与黄河之间的通道还是一片散乱。及至中更新世晚期，黄河开始形成宽谷，并通过刚形成的三门峡谷道。在晚更新世里，三门峡地区受到若干次新构造运动的影响而间隙抬升，在黄河及其支流岸边造成二、三级黄土堆积阶地。进入 1 万年前的全新世后，黄河河谷继续下切，两岸高低不等的河漫滩阶地，常高出河面 15—20 米。

为时 300 万年的第四纪，常被人们视为人类的时代，或称为灵生代，因为到这个时代里，人类终于从第三纪某一时期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成为能

制造工具的人。中国华北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发现过早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文化遗存，距今有一百数十万年。河北阳原县的泥河湾地点，发现不少人工打制的石器，也属于早更新世时代^①，这些是迄今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所见最早的文化遗存。作为黄河流域已命名的第一批居民，是生活在渭河南岸，秦岭北麓的蓝田人（因在蓝田县发现其化石而得名），他们分作两支，一支住在秦岭中段半山的公王岭，距今80~75万年，一支属于陈家窝蓝田人，时代约晚10万年，生活在灞河下游的平川里。

公王岭蓝田人生活的时代，正是华北地区气候极为温暖湿润的时期，这期间，秦岭北麓迎来了一批南方客，它们中间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獭、中国獾，还有中国爪兽、毛冠鹿和苏门羚，毫无疑问，这些华南动物群的成员是被良好的生存条件吸引而来的。蓝田人之后的北京人在周口店地区前后经历约30万年，构成了一个富有代表性的时代，大部分时间气候较为温暖，其情形与今日华北气候无大差异，属于标准的温带气候，四季分明，温而略干^②。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出现在距今二三万年前，由于全球气候变冷，华北地区的气温又曾大幅度下降，适于寒温带环境的云杉、冷杉林便乘机向山下河谷蔓延。从全新世开始气温回升，云杉、冷杉林又逐渐退缩到寒冷的北方或高山之上。

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共历二三百万年，中国华北大地上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也有一百数十万年，

蓝田人的头骨、颌骨化石遗留至今，也达七八十万年，可一直到姗姗来迟的全新世，蓝田人、北京人及丁村人、河套人的后代，才随着一系列文化成就的诞生，渐渐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前进的脚步之所以如此滞缓，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则在于生存环境具有强固的原始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抑制着人们在这里较快地摆脱困境。

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人类的蒙昧时代，“这是人类的童年”^③。人最初都居住在自己起源的地方及其周围，也就是非洲和亚洲南部的广大地区，然后根据可以利用的条件，不断迁移到其它地方。中国境内已确认的 11 处早期人类化石的地理分布，早自云南元谋猿人，晚至安徽和县猿人，乃是自早更新世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南向北逐步扩散和迁移的^④。要实现这样的迁移过程，新地方就必须具备适宜生存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要分布着大量的水体，可为人类提供食用水和鱼类食物。“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⑤。远古的黄河流域河湖众多，业经发现的人类化石产地和旧石器遗址或出土地点，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两侧（北方诸省中尤以山西省的分布情况最为典型^⑥），这样做的好处看来绝不会是单方面的。

早期人类总想通过迁移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处，

然而，任何一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又总是新鲜而陌生的。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们会长久地住下去，如若找寻不到，那他们只得在不断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中，由近及远地去熟悉周围世界。《易·系辞》上说：“上古穴居而野处”，这实际上包括穴居址和露天居址两种居住方式。天然洞穴冬暖夏凉，既能回避风沙、夜露的侵害，又能免遭猛兽的袭击。我国华北地区冬季比较寒冷，洞穴更是人类安身越冬的好地方，生活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猿人即以穴居闻名于世。但中国北方的石灰岩质地比不上南方，降雨不丰，纬度又高，所以洞穴不太发育。生活在北方各地的早期人类，要寻找到适合居住的洞穴也是很困难的。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先民只得另寻他处，在湖岸阶地，沿着河流的两侧阶地，甚至在广袤的草原上用自已的双手建立简易的居所，构成不同于洞穴居住的露天居址。这种居址有其完整的遗址结构，一般是用石块、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垒成一个大致呈圆形或椭圆形的矮墙，圆形的直径大小不一，通常约5米左右，矮墙留有一处可供出入的缺口；矮墙的内侧和中央有木柱或木棍搭成支架，上面再用草、树叶或兽皮铺盖^⑦。依靠这种旷野地带的简陋茅棚，史前人类渡过了无数个艰难的春秋，尽量克服着因严寒带给自己（尤其是孩子）的威胁，只是在新石器时代已很流行的半地穴式房屋，此时还很少见及，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困难也就更大更多一些。

他们每日所需的食物，统统取之于自然界。《礼

记·礼运》追溯往昔：“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这是常见的植物性、动物性食物。人类用火的历史已有五、六十万年，造火（即自行生火）的历史则是早期智人创造出来的。自从有了火食，人类在饮食方面进了一大步，不仅体质能得到增强，就连食物来源也比以前扩大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树木和瓜类的果实为人所必食，河蚌、蛤蜊、螺蛳等软体动物本来就“腥臊恶臭”，生食以后，会“伤害腹胃，民多疾病”^⑥，是为当时流行的“疾病毒伤之害”^⑦。火化的作用就在“以化腥臊”，减少肠胃疾病，使人能更好地消化富有营养的食物。

《韩非子·五蠹》上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庄子·盗跖》中也说过，“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有的考古学家借助古生物资料，用以说明在寒冷地区，更新世时期仍然生活着大群野生的动物，如披毛犀、猛犸象、驯鹿、北极熊、猞猁等，对于为数还不很多的猎人来说，食物来源毫无问题。古人也认为远古人类的食物够吃，韩非子的著作即说“草木之实足食之”，庄子的著作描述他们“昼拾橡栗，暮栖木上”，虽然有食物，主要并不是指禽兽之肉。远古人类并非不食禽兽，而是禽兽能飞善跑，实难轻易捕获到手，供人美餐。当弓箭尚未发明之前，少数几人外出打猎只可能空手而返，因为这时的打猎形式主要还是靠围攻。问题是禽兽多于人类，多到

什么程度？既然说“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皆巢居以避之”，那么，人类定然处于一种势单力薄，无法抵御的被动位置上。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远祖时常踟躅于山麓林草之间，徘徊于河岸平滩之上，四处觅食，追逐打闹，但他们人数很少。有人估计，在大约距今200万年前，史前人类约有12万人；100万年前大约有20万人；30万年前大约100万人；25,000年前有330万人；10,000年前有530万人。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地球上的人口才第一次突破一千万的大关。^⑧占人类历史99%以上时间的旧石器时代，中国黄河大地分布着多少人口呢？根据现代狩猎—采集者群体的人数，一般是10—50人，通常平均为20—30人。这样大小的群体在其他的灵长类中也是普通的，可以认为猿人的地区群一般也是二、三十人一群，这是他们的基本社会单位^⑨。中国在1949—1979年期间，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六七千处，已公开发表的达六千余处，其中数百处进行过田野考古发掘。埋藏在地下，目前尚未发现的遗址还难以计数。这六七千处遗址分属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当然以华北地区的分布最为密集。新石器时代初期原始农业已经出现，新的聚落形式一般以50人左右为限，全国算做1万处遗址，黄河流域取其半，黄河大地新石器时代的门槛人口约为250,000之众，这也是黄河流域在旧石器时代人口从无到有，从最初的数千人发展到最后的

估计数字。

试用旧石器时代二三百万年的历程加以衡量，黄河大地的人口增长率就显得微乎其微，十分可信的是，这种人口慢速发展的情形却是与当时任何一个方面的人地关系相吻合的。时至更新世，这些在数量上和创造能力上都还十分有限的人类，的确已经属于自然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大自然也以自己的本来面貌，不加掩饰地迎接了他们。大自然向来具有残酷无情和善通人性的双重性格，它表现在早期人类面前的更多的是前者，而且其表现形式既有公开性的，也有隐秘性的。风雨雷电之类自然现象唤起的灾害，素来为人所敬畏，夜间强劲的西北风时常使人们彻夜难眠，大雨倾盆，眼看着建在背风、向阳小丘缓坡上的茅棚被暴雨冲毁，也束手无策，有时蔓延而来的山火逼迫他们放弃原来的居住地，一场灾难之后，居址一片凋敝，植被残破而稀落，野兽四处逃窜，使他们已经有些正常的生计大受影响。就一般而论，天气寒冷之时，他们蜷缩在简陋的房屋里什么也干不成，食物的供应就难以为继；天气变暖之时，也许正当他们戏谑于青山绿水、茂林修竹之际，各种传染病正滋生蔓延，病原体通过毒虫、水龟、蚊虱的传播，不知不觉侵入他们的肌体，在损害其健康之后，大大减损了他们的寿命。在已发现的 40 多个北京猿人化石中，约有 1/3 未活到 14 岁，约有 1/4 死于 30~50 岁之间，超过 50 岁的就极其少见了。

总之，远古时代未经人类开发的大地，其面貌既原始又荒凉，其面目极为狰狞，人们居于其间，要做成一件事都必须付出超常的代价。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自然环境，西北面是起伏的山丘，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硕猕猴、剑齿虎、豹、熊、豺、狼、獾、纳玛象、野猪、斑鹿等出没林中，山洞里居住着洞熊、鬣狗和獾等。北京猿人能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居住，是与洞熊、鬣狗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殊死搏斗才赢得的，洞穴内的堆积层中留有几层鬣狗粪，就证明洞内曾数次变成了鬣狗窝。洞内的争夺如此激烈，洞外的形势当会更为严峻，成群的豺、狼，凶猛的虎、豹，力大无穷的棕熊、黑熊和野猪，都被认为是北京猿人生活中的致命劲敌。在山西汾河流域创造了丁村文化的丁村人，在汾河两岸留下了相当密集的旧石器地点，与他们共生一地的还有27种哺乳动物，如梅氏犀、披毛犀、德永氏象、纳玛象、野马、野驴、赤鹿、中国扁角鹿、原始牛等。黄河上游的河套人生活在河套南部的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这一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哺乳动物群，累计共30多种，内有最晚鬣狗、披毛犀、诺氏驼、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蒙古野马、赤鹿、普氏小羚羊等。每一处远古人类生存之地，都有大批野生动物出入左右，其中以哺乳动物为主，从而证实这一带不仅是人，也是其他哺乳动物宜于生息的地方。考古学家注意到大批动物的存在，可为人类提供衣食之源，却忽略掉远古人类是

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兼食小型啮齿类、食草类和软体类动物的事实，大型兽类对于人类来说，论食物是潜在的、次要的，论威胁却是当前之大敌。有一个较长的时期，人们为了躲避野兽，纷纷逃到树上构木为巢，还留下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名称——有巢氏。至于衣着，也并不是以兽皮为主，“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⑧，捕兽本身就很难，若非靠人力捕获，兽皮也难以保持完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只是赤身露体，夏天收集好柴火，冬天则用来烤火驱寒。《韩非子·五蠹》中所说：“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那是就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有了弓箭和技术高超的猎人情况而言。

如果说猛兽的攻击只会威胁到个别人体或群体的安全，在更大范围内殃及人类的只能是自然灾害。中国众多的先秦以至秦汉历史文献之中，保留着许多优美的神话和传说，其中发生在尧舜禅让时代的洪水传说，就是一段后人永远景仰的故事。

这场大洪水的起因，据《淮南子·本经训》，乃是“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概因“共工与颛顼争为帝”而引起的^⑨。洪水之大，据《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这样巨大的洪流来自何方呢？有人说：“洪水从地底下喷涌而出，象脱缰的野马四处奔腾”^⑩。《吕氏春秋·爱类》却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